

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湾分离主义者为推动其“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乃不遗余力地建构日据时期“日本统治肯定论”，片面肯定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现代化”的贡献……这对不久前仅是上个世纪，无人曾遭大肆屠杀与压榨的被殖民者，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 编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史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德泰 主编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

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 编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108-0687-2

I. ①日…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殖民地-历史-台湾省-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5111号

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 编辑
出 版 人 徐尚定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0
字 数 65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08-0687-2
定 价 68.00元

目 录

大陆部分

日本对台湾、大连的统治与人民反抗斗争之比较.....	关 捷	2
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	陈小冲	12
台湾总督府文官制度研究.....	王铁军	21
日据初期台湾企业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	周翔鹤	30
日据时期对荷据台湾史的研究.....	杨彦杰	45
日据台湾、大连时期电影业研究.....	李 倩	54
“族”与“国”：李春生与清末民初的台湾.....	陈建樾	61
试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妇女的“皇民化”塑造.....	胡 澎	83
“米糖相克”与总督府米糖统制		
——日据后期台湾殖民地农业之初探.....	王 键	91
台共风云——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二.....	杜继东	117
日据台湾时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原因再探析.....	李 理	133
陈仪对日据下台湾的考察及研究.....	褚静涛	149

臺灣部分

日據殖民在臺近代化本質及其影響.....	戚嘉林	163
----------------------	-----	-----

日據時期的清代臺灣史研究回顧——以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研究年報 與光復初期臺灣島內發行的雜誌為例.....	許毓良	172
從《臺灣神社與宗教》管窺日據時代臺灣佛教....	卓遵宏 徐一智	192
日據時期的蘭嶼.....	陳文添	207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藏臺灣數據探析.....	張園東	218
日治時期臺灣的漏籍問題.....	王學新	229
20世紀30年代臺灣對華南的水泥輸出貿易.....	陳慈玉 蕭明禮	239
第一回高砂義勇隊出發前夕的臺灣 ——1940年日軍南進的系譜.....	傅琪貽	252
從參拜靖國神社風波談臺灣在后殖民時代的主體性迷思...	李功勤	264
日本統治末期臺灣工業技術人才養成 ——臺南與東北的交會.....	高淑媛	275
科技與社會 ——以臺灣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為例（1919~1934）....	林蘭芳	282
准軍人的養成——日治時期臺灣中等學校的軍事訓練....	鄭政誠	295
臺灣共產黨人張志忠.....	藍博洲	310
在中國東北的臺灣人（1908~1945）.....	許雪姬	324
試論后藤新平與伊澤多喜男 ——從專賣局與鴉片事件談起	鐘淑敏	333
臺灣總督府樟腦專賣政策與霧峰林家*.....	黃富三 黃頌文	341
日據時期臺灣與東北地區煤礦業之發展 ——以基隆與撫順煤礦為例.....	翁嘉禧 王林楠	354

日本部分

殖民地時期真宗大穀派在臺灣布教的演變 ——臺北別院落成的象征意義.....	松金公正	371
戰后初期在日臺灣人的國籍變更問題 ——以澀穀事件的考察為中心.....	阿部由理香	403
二次大戰前后的臺灣人.....	阿部賢介	410

日本統治下臺灣の社會事業政策研究.....	大友昌子	423
從恒春半島的視角來尋找臺灣殖民地化的思想淵源——關於18世紀 以來歐洲的恒春半島初期形象的演變過程.....	羽根次郎	432
后藤新平與臺灣 ——對殖民統治與文明之間關係的考察.....	春山明哲	447
殖民地臺灣日語教育淺論 ——以官方學校教科書的編寫為中心.....	酒井惠美子	459
「大日本帝國」の臺灣統治構造及統治原理.....	檜山幸夫	467

大陆部分



日本对台湾、大连的统治与人民反抗斗争之比较

关 捷

一

从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代表在烟台交换《马关条约》，日本开始占领台湾，至1945年10月25日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向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投降，台湾被割让（即日本统治）50年又170天^[1]。日本对大连的统治则晚于台湾10年（即1905年10月14日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擅将旅大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开始），至1945年8月22日苏军进入大连，日本统治大连40年又313天宣告结束。

日本统治台湾，是以殖民地形式进行的，统治大连是以租借地形式，施行不是殖民地的殖民统治。鉴于日本租借大连比占领台湾晚十年，因而日本在台湾所推行的措施，诸如统治机构、经济统制、文化教育的皇民化等的“经验教训”，自然成为统治大连的借鉴，有的几乎是完全照搬，而且其通过警察、宪兵、特务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奴役的强度和深度比之对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两地各族人民对日本统治的反抗形式、规模、作用、后果有相似之处，亦有若干各自的特点。因此对日本统治台湾、大连的措施与人民反抗斗争进行探讨，对揭示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抨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观以及教育对日本在台湾、大连统治的模糊乃至错误评估是有意义的。

二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大连两地的侵略、霸占、统治过程，也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过程。

日本霸占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省及其澎湖列岛，是以军事为后盾，通过甲午中日战争打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的，是直接武装侵略中国的严重后果。中国各族各阶层人士对签约割台议论纷纭，以各种形式表达心声，乃至提出挽救之法。

容易获知朝廷内情的廷臣疆吏纷起反对《马关条约》，谏阻割地的奏章、上书如雪片飞入京城宫中。对此加以剖析的文章、论着所在多有。^[2]仅廷臣疆吏的百余篇奏书概括起来有五种主张：一拒和再战，二迁都实行长期抗战，三借助各国干涉保护，四杀李鸿章以示废绝和约，五公布约文请中外公议。^[3]这些针对时弊的主张表明他们是忧国忧民，敢于进谏之士，尽管无法被清廷采纳，却对激励国人推翻腐败清政府的决心有积极作用。一些下级官员参加劝谏活动的人数达575人次之多。这些人分布于下述政府各机构。^[4]

部 别 人 数	内阁	礼部	吏部	户部	工部	兵部	刑部	翰林院	国子监	其他
	171	14	61	49	28	27	36	128	22	39

除廷臣疆吏外，在京会试的举人也“上书力争”，尤以康有为等1300余人的“公车上书”，既表示反对割台，又提出政治改革问题。台湾各界反割台的声势浩大。台湾人民听到割台“凶耗”，奔走相告，万众一心，“鸣锣罢市”。^[5]并停止向清廷交纳厘金，直到台湾回归再恢复缴纳；盐馆停售食盐，以备战时急需；藩库之银禁止外运，以供抗战缴费；各制造局加快赶制武器，以备抗日之用。^[6]影响最大的是台北绅民的临时应变措施，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既“抗朝命”割台，又可御敌寇而保台，因此虽然“台湾民主国”失败了，但它同日本占领者的斗争没有停止，其所开启的“攻防战的战端”，“台湾人意识形成的起点”，却应予以很高的评价。^[7]

日本占据大连地区^[8]，是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的甲辰日俄战争之后，从日俄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中转过来的租借地。十分明显，大连地区（日本称为关东州）是日本的租借地。然而日本在日本国地图中却将大连地区绘成与日本本土一样的红颜色。

俄国“租借旅大”后，激起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遂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力拒俄约^[9]，以保危局”的运动。而中国对日本的转租旅大反应却不强烈。其原因一是日本是从俄国手中承袭下来的，国人只以为租借者易人而已，二是俄国已租借旅大7年，中国拒俄数年，未收到实际效果，中国人的斗争锐力受到损伤，因而政治舆论斗争远没有日本割台时的明显。

台湾和大连人民自发地进行的反占领武装斗争大体相似。《马关条约》谈判时，日本就派兵攻占澎湖列岛，封锁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伺机攻占台湾。割台手续尚未交换，日本陆海军已扑向台湾北部海面。1895年5月31日《交接台湾之据》签字后，日军于6月7、9两日分别占领台北城和沪尾要塞，17日，已被日本任命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的桦山资纪建起殖民统治政权。日军的侵入台湾，激起各地人民的反占领斗争。

以农民为骨干的台湾各地义勇奋起配合黑旗军抗击日军的割占。1895年5月29日日军近卫师团占据澳底后，于翌日直扑基隆，在瑞芳受到阻击，6月2日开始攻占瑞芳、基隆、台北后，以刘永福（1837—1917）为首的黑旗军以及新楚军的清军，仍与日军联合坚持抗日斗争。6月11日日军进犯台南门户新竹。此时，以“愿与倭儿战一番”^[10]的吴汤兴与徐骧、姜绍祖等义军和清军杨载云等凡来“会者万人，遍山遍野”。决心对日军“声罪讨之”^[11]。14、15日义军从四面八方逼近日军侦察队，攻打日军“弹无虚发，日军仆者相继。”^[12]但当21日日军大队犯新竹时，由于义军武器窳劣，粮饷断绝，而主动后撤。新竹陷后，义军组织二次反攻，大小战斗20余次，牵制日军一个月。不幸姜绍祖在激战中负伤，被俘后殉难。

台北地区人民抗日队伍状况表^[13]

活动区域	抗日军首领	抗日军人数
台北	陈秋菊、詹振	分别拥有义军数千人
金包里 北投	许绍文 杨势	分别拥有义民千余人
宜兰	林李成、林大北	分别拥有义民千余人
杨梅 三角涌 大嵙崁	胡嘉猷（阿锦） 苏阿力 简玉和	各拥有义民百余人或数千人

随之8月14日~30日，义军在大甲溪、台中、彰化、云林、嘉义等地与日军激战。28日，日军

爬向八卦山，义军奋起与之肉搏。危急之时，吴彭年率部增援，毙敌千余人，并毙击日旅团长山根信成中将。^[14]同时，吴彭年中弹捐躯，其部伤亡殆尽。吴汤兴亦战歿山下。后黑旗军与义军配合曾一度收复雲林、苗栗地区，歼敌千余名。

10月11日，北白川能久亲王率近卫师团攻击嘉义，王德标率部与义军首领徐骧、林义成、简精华等部联合抗击日军，由于在城外埋下地雷，炸死日军700多人。日军撤退时又遭伏击，北白川能久亲王重伤致使毙命。不久，徐骧等在防守台南屏障曾文溪时重伤后牺牲。^[15]王德标与前来增援的总兵柏正才在与日军血战时中炮阵亡。^[16]曾文溪陷落，台南危在旦夕。时刘永福部柯壬贵率军镇守台南，虽有刘永福与义子刘成良在安平炮台支援，终因外无援兵，粮饷断绝，士兵饥疲无法支撑而溃散。21日台南失守。同年底，陈秋菊、詹振、林李成、胡嘉猷等率北部抗日武装，趁元旦日军松懈之机，袭击各宪兵所，包围宜兰，直指台北，激起2万民众的响应。柯铁等举简义为首，聚集人马，决定牵制日军于中部地区，乘便袭击南北两路，展开军事行动。分别在南投、斗六、鹿港等地围歼日军。同时，南部号称“十二虎”的12人率部攻嘉义，袭击派出所和弁务署。林少猫在魏开、陈鱼等地袭击宪兵屯所及阿公店、赤坎等地。^[17]持续数月的台湾军民抗击日军占领的武装斗争基本结束。台湾军民抗日斗争历经大小百余次战斗，击毙日军官兵4800余人，击伤日军2.7万人。最后虽然失败，但表现出的卫国保家之牺牲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日本开始统治大连也遭到大连人民自发的武装反抗。规模虽小，却给日本一定打击。1905年，日本在台湾已进行殖民统治达10年，而日本在大连的统治则刚刚开始。9月26日^[18]，碧流河农民郭正人在东老滩（今普兰店市碧流河乡）率20多人武装袭击了日本警察，毙伤日警、巡捕5人。1906年初，貔子窝警察派出所诱杀抗俄抗日义勇军首领马福连，激起马福连部400多人的愤慨。7月22日，马福连旧部赵长峰带领配备了一些机枪、火炮的百余人，攻打占领貔子窝的日军。此次进攻兵分三路：一路警戒、阻击来自铁路守备队的援军；二路袭击貔子窝街区欺压中国人的日本浪人和日本人开办的商铺；三是围攻貔子窝日本警察派出所。交战中击毙日警3人。^[19]又有金州三十里堡大盐场农民吕永发，对日军、警察、汉奸为非作歹，异常义愤，他曾组织12名农民到处袭击日警和汉奸。7月26日^[20]，吕永发带领抗日武装赶往郭家屯（今属四十里堡乡），处死为日本效力的汉奸巡捕王明爽。翌日，吕永发又率27名农民包围日本老虎山（今大连市金州区七顶山街道）警察派出所，先在大门外以火封锁，随后向院内射击，击毙日警多崎山吉，另伤巡捕两人，余皆从后门逃往金州城。日本当局对吕永发极为惧怕，急调铁路守备队围歼吕永发的抗日武装。吕永发被迫率部渡海，转入复州境，经过休整，又在石河驿板岚子登陆，袭击石河驿、普兰店日本警察派出所。一年后，吕永发仍率部继续同日本侵略者战斗。1908年7月26日，吕永发率队惩罚了为日本效忠的金州民政支署老爷庙会会长姜日淑，并杀死貔子窝民政支署差役张俊昌。8月15日，吕永发所部在金州三十里堡盐场与日警大队相遇，面对日警的强大，吕永发沉着应对，率队边战边退，仍击毙伪巡捕王玉清，伤敌数人。^[21]同年冬，日本当局组织铁路守备队及军、警、宪、特，疯狂围剿吕永发。吕永发部损失惨重，迫于形势而将队伍解散。后终被汉奸出卖而遭杀害。

大连地区人民自发武装抗击日本侵占的斗争，自1905年至1908年多次袭击日警，惩罚汉奸，他们的斗争对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是个沉重打击，对激发人民的抗日斗志起了积极作用，促使日本统治期间的许多抗日群众惨遭杀害（仅金州西海岸被杀的抗日武装战士即有75人^[22]），抗日烽火不断燃烧。

从日本侵占台湾和租占大连初期，中国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自发的武装斗争，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台湾人民的反抗规模大，人数多，次数多；大连人民的斗争规模小，人数和次数少。第二，台湾的反抗是以打击日本的正规军为主，而大连的斗争则主要是袭击日本警察、巡捕，少有正面作战。第三，两地人民的反占领斗争，均遭到两地日本当局敌视，

全力进行武装剿杀，许多抗日志士被杀害。但是两地人民的斗争，对打击日本侵略者，激发中国各族人民爱国热情起了重大作用。

三

日本统治台湾和大连期间，中国人民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日运动。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被大陆割让，可大陆人民是密切关注支持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福建等地爱国志士到台湾参加义军，大陆向台湾抗日武装提供资金和武器。因为，台湾人民斗争的目标是赶走日本侵略者，回归祖国。正如胡嘉猷在讨日檄文中称：“此次征倭，上报国家，下救民生。”台湾中部义军提出赶走日军的目的是“回复清政”^[23]。均表明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台湾和大连的抗日斗争，既有武装斗争，人民起义，也有农工运动以及知识界人士的斗争。

（一）武装斗争的兴起。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各族人民的反抗，实行惨无人道的焚掠和屠杀。台湾北部日军第七旅团残杀宜兰人2454人，并将城市化为灰烬。中部云林有70多个村庄被烧，4000多幢房屋被毁，日军“杀良民之父、夺其母、害其兄、又杀其子、杀其妻、害其弟……且又将其家属及所有财产焚烧一空”。南部的潮州、恒春一带被害者达2053人，焚毁房屋5813户。^[24]在死亡面前，台湾人民没有屈服，仍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

1896年前后台湾北部抗击日军的状况表^[25]

活动区域	抗日军首领
宜兰方面	林火旺、林木火、蓝继明、蒋老福等
澳底、草岭、瑞芳、基隆方面	林李成、詹振等
淡水、金仑里方面	简大狮、卢锦布、李勇、李豹成等
三角涌方面	王猫研等
桃园方面	陈瑞荣、林凉、林天义、许才、林清云等

以铁国山（即太平顶）为中心的台湾南部人民武装抗日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1896年6月19日，在大坪柯铁率抗日义民军与日军激战，伤毙日本大佐、大尉等军官数人、士兵300余人，声名大振，被誉为“铁虎”。7月1日，简义等部2000多抗日军围攻云林，日军不支败走，云林光复。随之在彰化、北斗、员林、嘉义、埔里社各处均有抗击日军杀死宪兵、警察无数。7月8日简义率部又攻入鹿港街，促使汉奸别动队纷纷倒戈，有的充当抗日军向导，有的与抗日军协同作战。但是由于日军的不断增多，抗日军无法抵御日军的围攻，简义抗日军于7月12日撤出云林，退回铁国山。不久简义却在日本当局的压力下归顺日本，各处抗日军皆归柯铁统领。直到1902年，抗日义民的斗争仍是此伏彼起，日军则用“糖饴与鞭子”政策，一面实施高压政策，一面以优待条件诱降抗日将领，当数百名人员降服后，又以举行“归顺式”为名，将其诱至周围布满机关枪的会场，然后扫射毫无抵抗力的数百名抗日志士，暴露了日本殖民当局的背信弃义，残忍狰狞的面目。

南部地区的抗日运动也蓬勃发展。在台南的前山地区既有高耸入云的树木，又有丛生的荆棘，是抗日绝好的根据地。这里聚集着多支抗日军。

1895年台湾南部抗日军情况表^[26]

活动区域	抗日军首领
后大埔、温水溪	黄国振、林添丁、李欺头
十八重溪	阮振
番仔山	陈发
凤山管内	郑吉生、林春、陈鱼、黄国成、郭腾、简庆
阿猴方面	林少猫（即林小猫）

林少猫是南部抗日首领中最负盛名者。1896年，林少猫聚众数百人于台南凤山（今高雄）城南凤岭起兵抗日，队伍迅速发展至数千人，多次袭击凤山县城、阿猴街等处日军。1898年冬，林少猫又联合林天福部进攻台南日军，日军不支惊逃。1902年^[27]，林少猫忙于为母祝寿之时，日军乘机攻入山岭，与部众同遭杀害。^[28]南部其他抗日将领黄国振（镇）在嘉义、郑吉生在凤山、陈发所在番仔山等地进行抗日斗争。而对日军的烧杀淫掠，民众于1897年控诉日本殖民当局“政猛于虎，贪酷民脂”，“通译打人”，警察“笞挞无辜”，“寡妇室女，调戏装痴”，“看守强奸”，“生人害死，辱及死尸。”^[29]抗日军首领张福德、李欺头等发布文告，警告日军“勿违抗”，否则“身首要分张”。^[30]这时台南抗日军活动地区更加扩大。

1897年台南抗日军状况表^[31]

抗日军根据地	抗日军首领	抗日军人数
羌仔寮	黄国镇，张生福	700
基隆山	孙阮	100
竹仔林	李乌猫	400
冻水溪	陈其麟	100
隘开二佃	何贺、陈璧	100
冻仔脚	吴自得、萧福春	数百
崎内	李谟	200
三层崎	苏外、温添丁	100
横山	阮振	400

各抗日军虽分布广，却联系密切，配合作战，打败日军无数次，1898年，抗日军在嘉义周围多次与日军、警察激战，毙敌甚多。抗日军民遭日军警屠杀者也甚多。^[32]

总之，台湾中、南部的抗日斗争，自1896年至1902年的7年间，多次袭击日军警，予日本殖民当局以沉重打击。于是1902年4月，日军出动大量兵力，“剿杀抗日首领阮振、黄国镇、林添丁及其抗日军。在斗六、林圯埔，以及其他六处归顺式场中，骗杀张大猷等抗日同志几百人。”^[33]

较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大连人民的抗日斗争均在此伏彼起中进行。

（二）农工运动的展开。首先台湾农民掀起反抗日本殖民当局对土地的兼并和掠夺。台湾农民遭受日本殖民者与台湾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和盘剥，农民不堪欺凌与榨取，起而斗争。

1925年，台中二林庄蔗农成立“二林蔗农组合”，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遭当局拒绝后，蔗农拒不收割，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是为“二林事件”。同年农民抗争达12起，参与者达5290人。

事件中虽有3人被捕，31人获刑，却也使日本资本的利益蒙受损失。翌年台湾农民组合成立，1927年达23个支部2.4万名会员。同年农民组合先后由新文协及台湾共产党^[34]主导，两年间进行420次抗争。1929年，台湾日本当局破坏农民组合，逮捕骨干，威逼农民退出。农民以不屈的意志坚持战斗。

1930年，台湾的日本当局开始推行五年番地开发调查，拟迁移土著居民，强夺土地为日本资本服务。10月27日台中埔里雾社地区的人民首领摩那·罗达奥率众袭击雾社附近各社的日警驻在所，毙日人134名，夺取枪支180支。日本当局急调军警镇压，起义者毫不退缩，利用天险的地理防御作战，其战术之高超，战斗之勇敢，“使日军感到无比的惊骇”^[35]。日军竟惨无人道地用毒气弹轰炸^[36]，雾社起义失败，起义者死难644人，被捕564人。雾社起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迫使日本政府更换了台湾总督。

大连的农民运动是从反对日本当局抢占农民土地开始的。1915年日本向金州移民19户，占地建立爱川村^[37]。1920年春，日籍商人和田笃郎勾结金州民政署官员，强占三十里堡西甸子村150户的3000亩水田。当和田带人勘察水田时，农民无比愤慨，推举村长王忠玉和韩吉（希）贵等5人先行向关东厅请愿，不仅未获解决，反而训斥、监视、逮捕请愿人员。当韩吉贵获释后，带领乡民手持锹镐等农具前去与和田等拼杀，和田等逃之夭夭。韩吉贵便请求《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报道请愿消息^[38]，与此同时，西甸子村农民百余人齐集大连，游行示威，得到工人、市民和学生的声援。直到1921年6月20日，经关东厅长官出面协调，农民取得“长久耕种永不退佃”和收获“东三佃七”（土地所有者分三成，租佃者分七成）的权利，反占田斗争告一段落。

其次台湾、大连两地的工人运动，开始的时间不同。大连地区在俄国占领时已建立一些工厂。1905年日本接管工厂后，工人工时长，工资低，因而罢工斗争此伏彼起。早在1911年3月3日晚沙河口苦工2千余人不甘忍受每日只得2钱的工钱而冲出厂。^[39]据不完全统计，从1916年到1919年间，自发罢工达30余起，至1923年，已达162起，罢工人数28500人。1916年末满铁沙河口工厂450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3天，以厂方答应增加工资而结束罢工。1918年1月20日，川崎造船所大连工厂110名中国工人和日本70名工人联合进行自发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40%、发放退职金和夜班津贴、超产奖励以及设立救济等条件，罢工2天后，厂方应允增加工资、发超产奖，夜班发双倍工资，中日工人同盟斗争的胜利，工人受到鼓舞。25日满铁沙河口工厂又发生2155名工人（日本工人863名，中国工人1292名）怠工，提出川崎造船所工人同样的要求，厂方仅应允危险岗位的部分要求，而对其他工人采取“抚慰和训斥”手段，并逮捕6名怠工领导人。同年秋，因沙河口工厂2000人要求增加工资，遭厂方拒绝，而于10月7日开始罢工，最后虽给工人增加工资，却将罢工领导人抓起来或解雇。

更严重的是工人暴动。1927年12月28日晚，南关岭车站日本监视员说工人“偷运”煤炭，拷打3名工人，激起中国装卸工人的愤怒，他们以石头、瓦块或扁担为武器，捣毁车站运转室的玻璃、电话、信号器等，并打了管理员。大连警察局虽逮捕、监禁、殴打241名工人。^[40]罢工被镇压了，但工人们宁死不屈，仍在寻机斗争。

大连工人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并得到共产党的领导。^[41]大连第一个工人组织是1923年12月2日成立的中华工学会。工学会领导人傅景阳公开指出：“我们当今的世界，是日寇侵略我们中华民族的世界”，是掠夺中国物资和资源，压迫剥削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世界，因此我们要进行斗争。^[42]随之1924年4月28日又成立了印刷工会。翌年春印刷工会发动百余名工人以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3天罢工。在工人建立组织并领导工人斗争的同时，青年和商业店员也组织起来，展开一些斗争。

此间，大连人民要求废除日本的“二十一条”和收回旅大的斗争规模日渐壮大。1923年3月26

日,按条约规定,日本租借期满,应当归还旅大。但是,日本政府却持拒绝态度。这样一来首先激起大连人民的极大愤慨。身居租借地的大连人民遭受日本严酷统治18年,企盼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愿望极其强烈。早在1922年9月,旅顺师范学堂的学生曾掀起反对“二十一条”,收回旅大,排斥日货,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12月,金州人民也提出收回辽东半岛的要求。《泰东日报》不断刊载收回旅大消息,并曾以旅大人民的名义致电上海有关团体,揭露“日本人为欲达到保全满洲进图中原的野心,‘五七’^[43]胁迫,延长九十九年的有效期”的野心,希望国人奋起,督促政府,收回旅大。^[44]随着3月26日收回旅大日期的临近,全国各地各界乃至海外留学生、华侨都掀起轰轰烈烈的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爱国运动。但终因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日本政府的顽固推行其侵略政策而未能达到目的,不过也唤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激情。

大连工人运动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互相支持。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巡抚开枪打死群众,消息传到大连,大连工人组织了罢工斗争,并成立“沪案后援会”,以游行、募捐等形式予以声援。

在全国声援“五卅惨案”运动中,大连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简称“福纺”)掀起了大罢工。福纺厂女工占56%,童工占38%。纺织厂的车间阴暗潮湿,工时长达12小时,中国工人工资仅是日本工人的1/4,还经常挨打受骂,甚至工头田中定治郎无故杀害中国工人李吉祥,引起工人愤怒。工人酝酿已久的斗争,终于1926年4月27日,由共产党并通过中华工学会福纺分会领导,发动千余名工人罢工。厂方勾结日本当局进行分化、镇压。罢工领导人侯立鉴被捕后,厂方在警察署支持下,先行收买,后施酷刑,均无效果。面对敌人的高压,中共大连地委和工学会毫不妥协,于6月24日召开全市声援大会。与会的13家工厂3000多任务和附近农民、学生参加,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先后派张炽、邓鹤皋等到大连加强领导,并征得天津、广州、上海和香港工人阶级的声援。7月26日,厂方被迫答应工人要求,劳资双方协议复工。^[45]持续了3个多月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福纺工人的大罢工的胜利,既标志大连工人阶级的新觉醒,也表明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方针的成熟。斗争中,大连工人阶级得到了锻炼和壮大。福纺大罢工犹如一曲雄宏的凯歌,为全国工人运动增添了新篇章。

台湾的工人从20世纪2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全台各行各业工人达58万人,其中日本人仅3%,台湾工人占93%。工人在工厂受日本资本、民族资本双重压榨,工人生活无保障,还有受资本家及工头的责骂和无法形容的虐待。^[46]

台湾工人为了有组织的进行斗争,1919年台北印刷工人首先成立台北印刷从业员组合。20年代,受到大连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影响,在台湾的大陆工人于1923年成立台北华侨洋服工友会等众多任务会,这表明台湾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当时台湾已有文化协会^[47]等组织,指导工人运动的发展。1921~1931年10年间,台湾的劳资争议有513件,参与人数为36280人。工人斗争主要针对日本资本家严酷压榨和剥削,日本学者承认以日本人为争议对象的占60%以上^[48]。

在文化协会领导人王敏川、连温卿等组织下,1927年4月成立了有300人参加的台湾机械工友会。文协指导高雄铁工所的罢工,得到1926年6月成立的农民组合的支持,另外还有日华纺织会台北办事处、嘉义营林所和阿里山出張所的罢工等。1928年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之初有29个团体会员,翌年增至41个,个人会员万余人。很快台湾各地的砂炭、建筑、机械、制盐等行业罢工。后因总联盟成员受“左倾”影响,主张阶级斗争,而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并于1931年被禁。

从大连和台湾的工人反抗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压榨而举行罢工等形式的斗争可见,两地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要求,进而在各种工人组织及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罢工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表明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就能取得胜利。

与此同时,日本在台湾与大连进行殖民化(皇民化)运动。日本当局从制度、文化、教育、习

俗等各方面要把中国人塑造成日本人的思想性格，以使为日本长期统治服务。日本的强行做法遭到两地人民不同形式的抵制与抗争。^[49]

四

探讨日本在台湾、大连的统治期间，两地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斗争特点，对认清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腐败以及了解人民的斗争事迹，总结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台湾和大连的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前者是殖民地，后者是租借地，开始时间不同，大连较之台湾被占领晚10年。

其次，台湾和大连人民的抗日斗争，贯穿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始终。台湾人民的斗争始于1895年日军登上台湾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50年，大连人民的斗争则始于日本从俄国手中转租旅大，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40年。

再次，台湾和大连地区的反日本占领斗争的面广、形式多样，既有廷臣疆吏的奏疏抗争，也有文人学士的抨击，还有报刊的评说，且多以自发斗争逐渐转向有组织的运动，而且两地都有工人、农民、青年的组织领导，两地的共产党在领导群众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台湾和大连的人民抗日斗争都具有反侵略反殖民的战争性质，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并牵制一部分日军无力脱身扩大侵略战争。但是由于台湾是传统的勇营与近代化的日军对抗，大连多为民众单枪匹马的斗争，其人力物力有限，战斗中伤亡惨重，斗争最终失败了。

第五，台湾和大连人民通过斗争，得到了锻炼并获得发展。广大人民日益增强对日本侵略者和日本资本家的愤慨，即民族意识的激发；人民的斗争形式，手段不断变换，其斗争艺术不断得到提高。因此，台湾和大连的工人与农民在不断进行抗日斗争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注 释：

- [1] 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记台湾被割让50年又156天。如从1895年5月8日中日两代表在烟台换约算起，至1945年10月25日陈仪接受安藤利吉投降后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应为50年又170天。
- [2] 来新夏的《中日马关订约之际的反割台运动》，载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之《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42～53页；张雄潮的《光绪乙未廷臣疆吏谏阻割台的几种论调》，载《台湾文献》1967年3月，第十八卷第一期，第130～155页；黄秀政着《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一书辟专章叙述“割台与朝野的肆应”，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118页；关捷等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四卷战后篇第二章保台运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81页。
- [3] 张雄潮：《光绪乙未廷臣疆吏谏阻割台的几种论调》，载《台湾文献》，第十八卷第一期，第135～155页。
- [4] 见关捷等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四卷战后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 [5] 《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7页。
- [6] 见关捷等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四卷战后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 [7] 黄昭堂著、廖为智译：《台湾民主国之研究》，财团法人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1993年版。
- [8] 1898年俄国通过《旅大租地条约》，租借的是旅大，即旅顺、大连湾。当时尚无“大连”，今天的大

连市,当时只是20几个小渔村组成的“青泥洼”。俄国租借旅大后,1899年,在青泥洼建城,名之曰:达里尼市(意为“远方的城市”)、建港为“达里尼港”(今大连港)。1905年5月9日签订之《朴茨茅斯和约》第五项“旅顺口、大连(应译为“达里尼”)及附近之领土、领水的租借权,以及与该租借权有关并成为其组成部分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帝国政府。”见[日]堀真琴:《日露战争前后》,东京白杨社1940年版,第226页。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规定“中国政府将俄国按照日俄和约第五款(项)……允让日本国之一切概行允诺。”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39页。

[9] 指1901年2月,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谈判时,拉氏提出书面约款12条而言。

[10] 《民族英雄吴汤兴文献汇集》,《台湾风物》第六期,1959年12月。

[11] 吴德功:《让台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2~73页。

[12] 俞明震:《台湾八日记》,丛刊,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7页。

[13] 据《台湾抗战始末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页编制。

[14] 此据洪弃父《台湾战纪》记山根信成是8月29日在云林战斗中“罹重伤,旋死”,日《陆海军将官总览》称“战死”,也有称其在彰化患风土热病而死。见《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六卷人物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15] 徐骧牺牲的时间的另一说法为10月9日。见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

[16] 柏正才阵亡地点的另一说为嘉义。见陈旭丽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494页。

[17] 参见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第348~349页。

[18] 此据顾明义等主编:《大连近百年史》(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9页。而刘功成的《大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大连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记为1905年9月20日。存此以待考证。

[19] 见《大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第57页。

[20] 于植元等主编:《简明大连辞典》,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第856页记为1907年7月。

[21] 见薛天忠主编:《金县志》,大连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22] 刘功成:《大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第59页。

[23] 台湾宪兵队编:《台湾宪兵队史》,龙溪书舍复印本,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版,第200页。转引自《台湾历史纲要》,第349~350页。

[24] 见《台湾历史纲要》,第351页。

[25] 据《台湾抗战始末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23页编制。

[26] 《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42页。

[27] 《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58页。

[28] 见《中国近代史词典》第431页“林少猫”条,而《台湾抗战始末记》,记林少猫于1902年5月30日遭日军围攻,“迫其战死”。

[29] 《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46页。

[30] 《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47页。

[31] 根据《台湾抗战始末记》编制,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47页。

[32] 《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48~57页。

[33] 《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十二册,第58页。

[34] 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支部展开活动。见《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